

康玉华 祝秉耀 赵永新

汉语交际

Communicative Chinese



汉语交际

Communicative Chinese

康玉华

祝秉耀

赵永新

H1832 SINOLINGUA

BEIJING

First Edition	1991
Second printing	1994
Third printing	1997

ISBN 7-80052-170-2

Copyright 1991 by Sinolingua

Published by Sinolingua

24 Baiwanzhuang Road, Beijing 100037, China

Printed b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inting House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35 Chegongzhuang Xilu, P.O.Box 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简介

牛润珍,男,河北成安人,1954年12月25日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方志学。主要论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陈垣学术思想评传》,《河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河北省志》(著述志),《魏晋南北朝邺城初探》,《魏晋南北朝幽冀诸州要论》,《陈垣的宗教史观》,《陈垣对清史研究的贡献》,《河北方志考略》,《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等。

吴海兰,女,1976年生,湖北麻城人,1998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读博士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浙江学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何晓涛,男,1977年生,浙江新昌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在《北京社会科学》、《四川大学学报》、《中州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题 记

吴怀祺

隋唐时期史学思想的历史借鉴思想把对历史盛衰的总结，提高到一新的水平。

从西晋到隋亡，这 350 多年，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大震荡。在急风暴雨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唐王朝，要稳定统治、开盛世新局面，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总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盛衰总结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历史总结的开阔性。唐朝作为大一统王朝，把历史总结、编修史书，作为朝廷、政府的行为确立下来。设立史馆大规模修史，显示开阔的历史眼光，这是重视历史传统的新发展。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属个人修史，司马迁、班固写史不但不为朝廷所认可，相反还受到打压和迫害。《宋书》之作多为补续而成，《南齐书》经过“奏请”而作，基本还是私撰之作。《魏书》算是设局编修出来的。但作为大一统王朝政府组织修史，始于唐朝。

唐初，有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史的五代史之举，但未能成书。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修机构，重新开修五朝史，贞观十年（636 年）修成。贞观二十二年修《晋书》，这是六史。后来，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朝廷批准《南史》、《北史》行世。在这之前，即显庆元年，梁、陈、齐的五朝史《志》，即《五代史志》修成，附

于《隋书》。前后不过 30 年,在传统史学二十四部正史中,有 8 部正史是在这 30 年中修成的。史馆修史,反映出史学的进程,体现了重视历史传统的新特点。史馆修史一方面是官方控制修史大权,又一方面为大规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条件。史馆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如果说,两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高峰,形成史学民族性的基本特征,那么,魏晋南北朝史学则是在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史学,是传统史学横广式的发展,为传统史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1〕}在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隋唐史学的贡献在于:唐代以制度形式把史书的编修作为朝廷行为基本固定下来,“正史”的理念正式确立,重视历史的传统成为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官修”与“私修”相结合。唐初修八史,其中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是带有私修的特色;前六史中的《梁书》、《陈书》既是官修,又有私修的因素。官修但不排斥私修,甚至积极吸收私修史书的成果,官与私的结合,相得益彰,不但加速了修史的进度,而且使所修史书有特色,提高了史书编修的质量。

在历史总结中,有史臣,有人君,唐太宗亲自写史书的评论,还有经学家的参与。这在后面还要提及。

在唐之前和唐之后,私修国史,甚至被视为是违法的行为。“私史案”与相当一部分的“文字狱”,都是由私人修史导致的。

——历史总结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相当大的效应。唐初修史,从历史总结出来的认识,通过君臣之间的“求谏”、“纳谏”,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唐太宗,但太宗在历史面前还是“虚心”的,再难听的话,

〔1〕 参见拙作:《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题记》,黄山书社 2003 年版。

甚至有的人臣说他如果不重视百姓生活、不注意减轻百姓负担，不重视对继位人进行教育，那太宗也就是隋炀帝。这些话相当刺耳，太宗还是压下心头不快，不但听进去，而且注意收敛自己的欲望，在政治上实施惠民政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直接受益于历史，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治理、振兴社稷的措施。

唐朝后期，元稹说到贞观之治与一批谏臣的出现有关。他说：“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孙伏伽以小事持谏，厚赐以勉之。自是论事者唯惧言不直、谏不极，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讳为虞。于是房、杜、王、魏议可否于前，四方言得失于外，不数年大治。”〔1〕元稹对本朝盛世出现的原因，作出符合实际的总结。

历史总结有效性，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是找到影响历史盛衰变动的真正原因，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影响历史盛衰的原因。唐代君臣在总结中，提出不少认识，其中不少内容，前代史家也曾提出过，但唐朝君臣对历史的总结，突出的一点是“民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再如，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尅己自励耳”。〔2〕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3〕要能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关键是人君与直接统治百姓的刺史、县令。这就突显和发展了《尚书》、《孟子》的重民思想。

〔1〕《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元稹传》。

〔2〕《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3〕《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二是把历史借鉴与通变思想结合起来。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要认识到历史的经验总是发生在一定条件下,这里有“时”、“势”的问题,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也有“时”、“势”的问题。忽视这一基本要求,固执于历史经验,形式上重视历史的借鉴,但却收不到成效,还有可能走到相反的方向去。后世的“教条主义”根源之一,与此有关。

唐朝君臣总结历史经验时,开始意识到要有“通变”的眼光,一切都与条件有关。魏征说:“圣人举事,贵在相时,时或未变,理资通变。”^{〔1〕}《隋书》的《虞世基传》引虞氏的《讲武赋》,说:“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后见帝王之略。”《晋书》卷六十八着意记录了纪瞻对陆机说的话:“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之然耳。”

前面提到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了《论》,太宗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这里提出了顺“理”而治的论点,已经不局限于个别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通变思想在他们来说,还是初步的,但这和此前的历史总结,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

唐朝历史的通变思想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只有到了王夫之那里,历史通变思想才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这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的时期,王夫之的理性认识无法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是“求谏”与“纳谏”的结合。人主应当具有开阔的胸襟,倡导进谏并且真正做到纳谏。人臣还要有敢于进谏的“胆识”。

〔1〕《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历史经验总结能不能收到成效,这是一个关键。

唐朝的历史总结意识与前代相比,显然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但也要看到,作为封建君王,在纳谏上是有一定局限的。贞观后期,太宗已经不如早年那样能“纳谏”了,处理“边事”问题即是例证之一。封建社会君王纳谏一般总表现为“个人”行为;封建专制的制度,也无法最终解决自身产生的矛盾。

历史有没有借鉴的功能,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都有争论。近年来,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1〕}应该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

唐朝是历史盛衰总结思想、历史借鉴思想发展充分的时期。讨论这一问题是有价值的。

历史总结是史学思想的发展。经学大总结也影响到史学思想的发展。唐朝的历史大总结与经学大总结联系在一起。就在倡导大规模修史的同时,唐朝又开启了经学总结的工程。^{〔2〕}房

〔1〕 参拙作:《历史借鉴与当代社会》,1996年第三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 贞观三年,开始大规模修史,贞观四年即开始了经学的整理与修订;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孔颖达重修,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命令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这与八史之修前后时间相当,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传习浸讹,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多所厘正。“书成,悉诏诸儒议,各执所习,共非诂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颜师古参与《隋书》编修,是《晋书》监修之一。他在《左传》、《汉书》的研究方面,尤有成就,特别是其《汉书》注,尤为人称道。时人称他为左丘明、班孟坚之忠臣。

玄龄、颜师古、孔颖达等是大规模史书的编修者与组织者、领导者，也是经学整理的组织者、领导者。把唐朝的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看，对唐代史学思想的成就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隋唐时期的经学，按皮锡瑞的说法，是从南北朝的经学分立时代进入到经学统一时代。隋朝的统一，是南并于北，但从学术上说是北学并入南学（参见《经学历史·七 经学统一时代》）。但皮氏对此没有作出更多的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种因素的变动存在差异。文化各种因素以及制度的变动又有差异。政治制度变动与文化变动、政治与文化中各种因素的变动，又有各种复杂情形。^{〔1〕}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学术文化内在的特性是长期锻铸而成，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学的统一和历史大总结的要求，都是民族文化内在的凝聚力的体现。

经学的变化，影响到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在隋唐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唐一代的经学发展经历曲折的过程。唐前期，崇儒学，中经大历年间，经学发生新的变化，新学风对经史学都产生影响。至晚唐，儒学与佛道的碰撞中孕育了新的因素。^{〔2〕}史学思想在唐初、中唐与晚唐是不一样的。粗略一点，以

〔1〕 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 《新唐书·文艺传上》的《序》说，唐代文章变化，实际也是经学变动的缘故：“唐有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氏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牾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宛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大历年间为界,把唐代史学思想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大历年间出现新的学风,“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齐苴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1〕大历以后,柳宗元等一批学人继续发展这样的学风。〔2〕

唐代经学的学风与经史观念对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的学术到了后期则是儒玄学合流,最后到了隋之王通,儒学发展了。唐代《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唐太宗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确定儒家经典官方注解,充实经典的内容,恢复这些经典的权威,使儒家重新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3〕对《五经正义》的疏,有不同的评价,对每一《经》的整理中的长处与短处,也有不同的意见;其博杂的缺点也是事实,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用王弼的《周易注》,《诗经正义》用《毛传》,《书经正义》用《伪孔传》等。但从整体上看,唐至宋初的经学:“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4〕“唐人义疏之学,虽得失互见,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以破门户

〔1〕《新唐书》卷二百《儒林传下》。

〔2〕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第九章说到大历后啖助、赵匡、陆质影响深远,柳宗元至以执弟子礼于陆氏为荣。一时学风大变,“盖自大历而后,经学新说日昌,初则难《疏》,继而难《注》,既则难《传》。于是离《传》言《经》,所谓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大历后学术变化,又影响到以后史学思想的变化。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四十八章,第284页。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周予同注释本),1959年版,第220页。

之习”。〔1〕

所以,隋唐时期史学思想虽思辨不足,但论盛衰、重现实的思维特点,和其时的学风却是合拍的。

儒学的笃实学风,影响到史家的史学总结,反映在对经史关系的理解上,《隋书·经籍志》提出“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的认识,从文献产生角度说明“经籍源于史”。〔2〕史学家阐释这一文献观念,体现出了唐朝尊“经”但落脚点在“史”,重“史”但着眼点在“今”。《隋志》说: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这一段话从三个方面论说经史的关系:1,从“经籍”的根本精神上,论说了包括经书在内的所有文献与史官的关系,有史官记

〔1〕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998年重印本,第98页。

〔2〕 见拙作:《〈隋书·经籍志〉的史学观》,《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录,才有“经”,才有整个经籍;2,从“用”的角度,论说经的“其用无穷”,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这是经之用,也是史的本义;3,从文献记录、“书契”发生的角度上,说明经与史、与史官的关系。

另外,关于“正史”、“古史”并重的观念,关于史籍分类及史书编纂思想特别是纪传体的编纂思想,以及关于史才论等,在《隋书·经籍志》、《史通》和《五经正义》中都有新的阐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把《史通》和《隋志》、《五经正义》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当时经史之学的思想倾向。

另外,还要注意到宗教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如,道教的无为思想在唐初历史大总结中就体现出来,在提倡以人为本时加上了清心简事为本。^{〔1〕}

韩愈和李翱为道学奠定了基础,揭露宗教活动的膨胀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但在如何融会佛释的学理上,他们没有解决这一课题。

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新学风中的学人,“不守门户”,看重其学理,认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同而通之,搜择融液,与大道适,咸申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2〕}隋唐的佛教从三论宗、天台宗,到唯识宗、武周的华严宗和禅宗、以及禅宗南北二宗,这一过程中,儒释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对此,柳宗元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但在总体上,他看重佛理,重马鸣、龙树之道,主张吸收道释的学理。这一学术趋势对思想史及

〔1〕 见《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传》等。

〔2〕 《柳河东全集》卷二十五《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史学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本卷的作者有三位,牛润珍教授在博士生学习阶段,师从史学家杨翼骧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多有发明,对史馆制度有系统的研究,写有专书。这些,为本卷独到的探索打下了基础。另外两位是年青学人吴海兰、何晓涛,他们有志于著述,多有心得。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制度研究上,说到要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时,特别谈到治学,说:“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1〕本卷付梓时,想到一代中青年学人勤勉治学,颇有感触:重矣哉,好学深思者也。

本卷第一章、第四章由牛润珍撰写;第二、三、五、六章(包括第六章的附录),由吴海兰撰写;第七、八、九章(包括第九章的附录),由何晓涛撰写。署名基本上按撰述的章节次序进行排列。〔2〕

〔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2〕吴怀祺在全书统稿后,除撰写《题记》外,还撰写了《导言》部分。

目 录

作者简介

题记 吴怀祺

导言 (1)

第一节 重视历史借鉴的历史意识 (1)

第二节 学术思想变化与史学发展的趋向 (14)

第一编

绪言 (67)

第一章 唐代史馆官修史书思想与史家 (77)

第一节 史馆的建立与组织 (77)

第二节 官修史书思想与意识 (93)

第三节 史家群体结构与社会阶层 (111)

第二章 唐初八史对历史的总结 (129)

第一节 历史兴亡的探讨 (129)

第二节 治国与守国经验的总结 (146)

第三章 《贞观政要》的当朝史总结与历史教育思想 (169)

第一节 当朝史总结 (171)

第二节 历史教育思想·····	(194)
第三节 《贞观政要》的特色与影响·····	(210)
第四章 刘知几的史学总结与史学思想·····	(222)
第一节 刘知几的治学道路与成就·····	(222)
第二节 刘知几撰著《史通》的时代与历史总结的趋势·····	(230)
第三节 《史通》对唐以前史学的总结·····	(239)
第四节 刘知几的直书思想·····	(257)
第五节 刘知几的史学精神·····	(276)
第五章 唐代宗教与史学·····	(287)
第一节 佛道与历史思想·····	(288)
第二节 宗教与学术思想·····	(309)

第二编

绪言·····	(353)
第六章 大历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与史学·····	(359)
第一节 新春秋学的兴起·····	(361)
第二节 新春秋学的价值·····	(366)
第三节 新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	(391)
附:对《经典释文》的初步考察·····	(398)
第七章 《通典》的历史总结·····	(416)
第一节 中唐时期的史学变迁与《通典》的撰述取向·····	(417)
第二节 食货为先与礼教为本的思想纠葛·····	(423)